

程千帆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莫砺锋 编

凤凰出版社

以心悅以學
心明以公心粹

是非疑則度

之以遠事驗之

以通物參之以

平心

孫卿子語二

徐乙亥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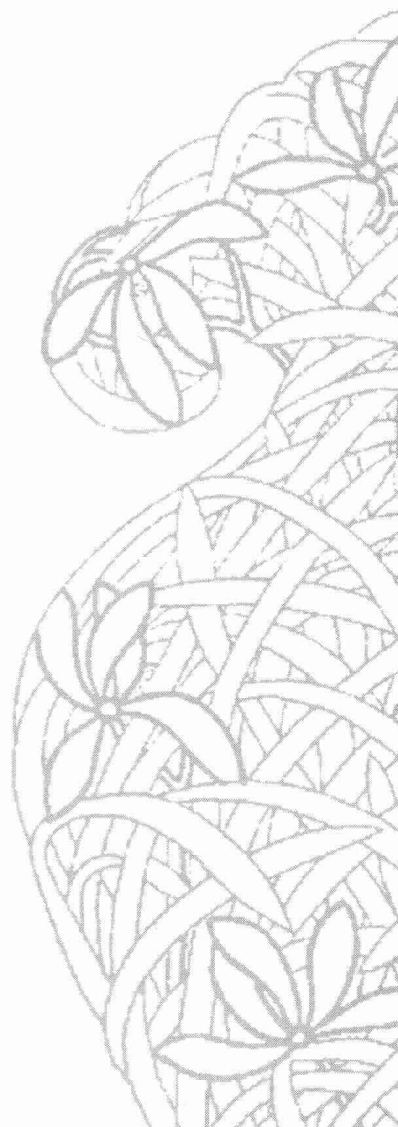
程千帆出將

辛巳十月二



程千帆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莫砺锋 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 莫砺锋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506-1878-7

I. ①程… II. ①莫…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844号

书 名	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编 者	莫砺锋
责 任 编 辑	林日波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秣周中路 99 号, 邮编: 211153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70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878-7
定 价	148.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928003)

序

莫砺锋

今年9月13日,是程千帆先生的百年诞辰。程先生的人生道路中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他自幼生活在一个清贫的家庭里,依靠课余写稿获酬才读完了大学。1936年,程先生自金陵大学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1940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1947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共和国成立以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理念。他在教学上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掌握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其时程先生尚不到四十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和教学两个方面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转眼到了1957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古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曾经历了漫长的旧社会,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已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像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程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教学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发韧初试的学术理念和教学思想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幸而天道好还,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代。1978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非常同情

其不幸遭遇,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份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老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为南京大学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一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1975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几乎在同时,他就接到了“自愿退休,安度晚年”的命令,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先生不幸于1977年遭遇车祸逝世。然而程先生并没有沉溺在苦难中不能自拔,他立即答应了南京大学的聘请。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得到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听者无不动容。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1978年8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千。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未来。他已经六十六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项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来说,这两项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位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程先生对此未有丝毫的懈怠,他来到南大后,争分夺秒地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古典诗学、古代文学批评之外,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煌煌十五卷的《程千帆全集》这部有目共睹的学术精品,就是其一生学术思考的结晶。然而在程先生自己的价值衡量中,培养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工作。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

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南大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二十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80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九人、博士十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时至今日，“程门弟子”以及程门的三传弟子，已经成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主体力量。程先生的学术理念乃至学术风格，都为这个学术团队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正因如此，当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体同仁商议为纪念程先生百年诞辰而编选一本纪念文集时，大家一致同意约请程先生的弟子每人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来展示程先生在培育人才方面的业绩，并委托我承担编纂之事。本书的作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曾在武汉大学亲承程先生音旨的老学长，二是曾在南京大学接受程先生指导的及门弟子以及目前正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工作的同仁（他们多数是程门的“三传弟子”）。此外，台湾地区政治大学的唐翼明教授曾请程先生指导其硕士论文，台湾地区清华大学的朱晓海教授则曾多次向程先生请益，他们与南大的程门弟子也相交甚密，谊若同门。他们获悉编选纪念文集之事，未经约请即主动寄来文稿，却之不恭，遂一并收入。在同门学友及同仁们的热情支持下，纪念文集已顺利编成。为了真实地反映程门弟子的学术水准以及程先生的教学业绩，本书所收的文章完全保持来稿的原貌；至于序次，则对上文所述的三个作者群体以先外校、后本校为序，在同一个作者群体中则依年齿长幼为序。本书的编纂工作主要是由我承担的，并得到了俞士玲、孙立尧两位“三传弟子”的协助。我作为程先生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在南大的及门弟子中又年齿较长，对编纂之事当然是义不容辞。但限于能力，编纂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妥之处，敬祈作者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岁月不居。程先生的百年冥诞即将来临，为本书撰稿的程门弟子中，郭锡良、吴志达、吴代芳三位学长都已年逾八旬，我本人也已年过花甲。编完书稿，心中突然冒出欧阳修在六十四岁时追怀其恩师杜衍的诗句：“门生今白首，墓木已苍烟。”追怀先生，感慨万千。

受业莫砺锋谨撰

2013年3月20日

目 录

序	莫砺锋(1)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郭锡良(1)
王安石诗初探	吴志达(16)
《世说》与文史之关系	吴代芳(32)
“通悦”: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	唐翼明(44)
徐陵中岁之后情境蠡测	朱晓海(58)
程千帆先生在南大	徐有富(78)
论唐诗意象的密度	莫砺锋(87)
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	陈书录(103)
欧阳修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复杂关系	严 杰(123)
全球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史 ——“文明对话史”丛谈	张三夕(131)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初论	李立朴(152)
论汉文帝	张 辉(172)
论《莺莺传》	景凯旋(184)
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巩本栋(200)
先秦道家对忠君观念的审视	曾广开(225)
说“渊懿” ——以西汉董、匡、刘三家奏议文为例	许 结(236)
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	张宏生(250)
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曹 虹(261)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	张伯伟(275)

《汉书·儒林传》“梁丘《易》”传承祛疑	武秀成(297)
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	蒋 寅(305)
朱熹的骈文批评	于景祥(327)
郭象“碑论”、“文论”考	程章灿(339)
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	陈 致(348)
汉代人性论中的“魂”、“魄”观念	徐兴无(379)
神圣仪式的想像和戏剧化再现 ——《汉武帝内传》文学性再探	赵 益(405)
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言说伎艺的视角看宋人的说话家数	俞士玲(417)
论明清时期的齐天大圣崇拜	苗怀明(433)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 ——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	徐雁平(444)
诗学与绘画 ——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	全程宇(458)
中国现代诗“行”的理论	孙立尧(471)
飞扬跋扈为谁雄 ——读杜甫七绝《赠李白》	冯 乾(501)
明遗民王嗣奭的“诗圣”说	刘重喜(512)
《经义考》学术成就及影响简论	张宗友(532)
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从杨令公之死故事演变看宋辽关系之民族认同	张春晓(547)
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文选学”	卞东波(558)
选本评注与词学轨式 ——论清代中期浙派师法的词史意义	闵 丰(574)
安史之乱与海东地域的文化认同 ——以渤海、新罗等史料为例	童 岭(598)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发微	于 溯(619)
《四库全书总目·〈类说〉提要》辨证	赵庶洋(631)
左思“弱冠弄柔翰”诗本事考	徐 涛(638)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郭锡良

对汉藏诸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最早一篇作品是雷顿(J. Leyden)1808年发表的《论印度支那民族的语言和文学》^①,1896年孔好古(August Conrady)明确提出了印度支那语系的分类,当时的认识实际是从地域观念出发的^②;最早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藏语系作出论证的则是李方桂先生193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语言和方言》^③。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对汉藏诸语言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原来据以提出论证的类型学的条件越来越失去作用。白保罗(Paul Benedict)在1972年出版的《汉藏语概论》推动了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④,但他是从同源词的角度来考察系属关系的,选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任意性,缺乏严谨的对应规律,可信程度不高。不少步白保罗后尘者,更加主观、任意,各执一端,使目前汉藏诸语言的谱系划分纷纷乱抵牾,莫衷一是。如何看待汉藏语系?怎样对汉藏诸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意见大相径庭。有人宣扬汉藏诸语言构成一个语系已经是常识问题,我们却大不以为然。

一

语系是从语言分化着眼的,它是以印欧语为材料建立起来的;是否适合东方汉藏诸语言的现实呢?这还是一个疑点成堆的大问题。

我们看到,现在不少研究者在讨论汉藏语系及其谱系分类时,大都是同语言单源说和人类起源单中心论分不开的^⑤。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类人

* 本文是2007年为参加“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学术论坛”而写的。初稿、修改稿曾送各方面专家和友好审阅,承张传玺、伍铁平、李维琦、陆俭明、王宁、鲁国尧、蒋绍愚、宋绍年、李小凡、陈保亚、孙玉文、邵永海、汪锋等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多有采纳,特此致谢。

① 参看岑麒祥《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

② 参考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第18页。

③ 参考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7页;又,同注②,第19页。

④ 同上,第51—54页;又,同注②,第21页。

⑤ 参看(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9页。

猿和古人类化石十分丰富。它说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了中华大地从猿到人转变的客观条件,在这广袤的大地上,禄丰古猿、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化石分布极广,涵盖的年代有几百万年,进化链条基本上没有缺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①因此,我国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一般都不相信西来说、单中心论。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说:“总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既不是来自中华大地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②就是在西方,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的单中心说也已发生动摇;因为被载入西方教科书几十年的“人类的祖母”“320 万岁高龄的露西”这一“东边的故事”,由于 1995 年古生物学家米歇尔·布吕内在乍得沙漠深处发现人猿化石阿贝尔而被质疑^③。另外,通过遗传基因研究人与人的亲缘关系固然有它的独特作用,但是当用它来解决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时,恐怕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困难。其实即使人类起源于单一中心,也不能决定语言就一定是单源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语言产生于人类发展的哪个阶段并没有确定的结论。再退一步说,即使语言产生在“东非老太太”走出非洲之前,可是“夏娃”在 15 万—12 万年前走出非洲,她的后裔在 9 万—7 万年前进入西亚,在 4 万年前进入东亚和欧洲^④,那么欧亚两洲的现代人类分开活动都已在四万年以上;经过这样漫长时间的分化发展,他们用的还能是同一种语言吗?硬要把它还定作同源,试问,这在语言比较研究中又有多大价值呢?

我们无意讨论语言起源的问题,也不准备研究中国境内诸语言的系属,只想探讨一下所谓的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真实关系,即它们是否真是一个语系?我们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境内诸语言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是肯定弄不清楚的。下面就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来进行讨论。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 页。

② 《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 页。

③ 见法国《周末三日》周刊 2003 年 9 月 10 日一期的文章《错误的科学课程》,转述自《参考消息》2003 年 9 月 26 日《教科书的错误》。

④ 参看(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59—61 页。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大地在八九千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中游、下游的炎帝族、黄帝族已经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阶段,经过斗争、融合,组成了近亲的部落联盟,成为华夏族的最早核心。他们所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考察,大约就是考古学上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约前 5000—约前 3000 年)、大汶口文化(约前 4300—约前 2500 年)和山东龙山文化(约前 2900—约前 2000 年)。这一文化经过尧、舜,传承到夏、商和西周,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进一步发展了华夏文化,部分蛮夷等族也融合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向南发展至吴、楚地区;战国时期华夏文化更向巴、蜀、百越、百濮和苗、蛮地区发展,远涉湖、广和川、贵。秦始皇统一六国,北起长城,南到海隅,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因此,黄河流域既是华夏族和华夏文化起源的摇篮,也是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同其他各族及其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新石器时代,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北面,有红山文化(约前 3500 年);再往北,长城外还有一支细石器文化,这应该是匈奴、通古斯族祖先的遗迹,他们大都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部族,不断向西南发展,长期与华夏族发生斗争、融合。甲骨文中的鬼方、土方,周代的玁狁、东胡,汉、晋时代的匈奴、鲜卑,唐、宋时的契丹、女真,都是这一文化的后裔,他们是与华夏族同属蒙古人种而语言各异的部族。

新石器时代,在南方长江流域中游和下游也有大溪文化(前 4400—前 3300 年)、屈家岭文化(前 3000—前 2600 年)和河姆渡文化(前 5000—前 4000 年)、良渚文化(前 3300—前 3300 年)。传说中的九黎、三苗,周朝的群蛮、百濮,是这些南方古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传说炎帝、黄帝与蚩尤间发生过一场大战,大概就是南方九黎族向北发展与华夏族争夺中原的一种反映。九黎失败,退回长江以南,就是尧、舜时的三苗和后代的苗、蛮;留在北方的部分就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了。春秋时期的百越、百濮主要应是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继承者,融合于楚。百越的语言系属与华夏族是不同的,《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透露出古越语与今天壮语间的一定联系^①。

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是东夷族的活动范围,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是它的著名首领。不管它同炎帝族是否族属同源,但它自始就同华夏族邻居杂处,夏、商、周三

^① 参考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初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又,赵日和《闽语辩踪》,载《福建文博》1984 年第 2 期。

代的九夷、淮夷、徐夷，同华夏族有和有战，不断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使华夏族在群体上、文化方面都不断发展、壮大。东夷同华夏族的语言原本是否相同，很难深究，本文也已无讨论的必要。

在华夏族的西面，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叫做“氐”、“羌”的游牧部落，他们同华夏族有着很多联系和交往。甲骨文中的羌方，已臣服于商。周人同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常常互相通婚，还联合抗商。周武王灭商，羌人就是积极的参加者。到了春秋时期，通称西戎的羌人各部，活动在河湟地区和渭水上游，有的与秦、晋杂处，晋人常联合姜戎与秦争霸。戎夏之间，融合与斗争并存。战国时，秦国日益强大，武力扩张至渭水源头，羌人的一支遂从河湟西迁、南徙。留在西北的羌人，汉朝初年曾臣服于匈奴，后来归附汉朝，时服时叛，内迁外徙，不断与汉族斗争、融合。魏晋时汉化已经相当深的氏族苻氏大姓曾在北方建立前秦，吕光继之建立后凉，羌族姚氏大姓也建立了后秦，公元416年后秦被东晋所灭。从三代就已出现在西北的“氐”、“羌”经过两三千年的融合、斗争，除西迁、南徙的部分外，至此时大致已经融合于汉族或其他北方民族。

羌人与华夏族是否同源，看法分歧。一说，炎帝姓姜，炎帝族也就是姜姓部族。炎帝族向东发展，在黄河中、下游建立农耕社会定居后，留在西北继续过着游牧生活的姜姓部族就被叫做羌、羌人、西羌。“羌”就是“姜”，因此羌族是与华夏族同源的。但是，这只是根据传说作出的一种推论，并非信史。《左传》记载了姜戎氏驹支对答晋国执政范宣子诘问时的一段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襄公十四年）这里明确说明了当时（春秋时代）的羌人与华夏族既是不同族属，也是不同语言的。羌人从夏、商时代就与华夏族交往，到春秋时代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关系越来越密切，不可能是分离久远造成的“言语不达”，也就是说，不是分化的结果。

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怎样对待六朝以后典籍中提到的“羌”人部落。一般都把它视为先秦的“羌”族的后裔，甚至把吐蕃（藏族）都论断为来自古代的西羌，但这是缺乏坚实根据的。比如《新唐书·西域下》提到苏毗“本西羌族”、多弥“亦西羌族”，当时多弥羌分布在今青海南部与川、藏接界的通天河一带，苏毗羌分布在多弥羌的西面；它们虽是来自原河湟地区古羌人的后裔，然而后来“为吐蕃所并”^①，也就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7—6275页。

是融合到吐蕃中去了。《隋书·西域·党项传》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①他们“开始活跃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②。《隋书》既称它为“羌”,又说是“三苗之后”,这是矛盾的;还说“皆自称猕猴种”,这又与吐蕃相同了。从党项羌出现的时间、地域和所处的社会阶段及其习俗来看,它确实是与吐蕃有密切渊源而与古羌人未见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党项来说,“羌”的称谓是后人归类的泛称,并非族源专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今(永平年间,58—75)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③这三章诗的汉译和白狼语的汉字译音都是44句,每句4字。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白狼歌》的白狼语汉字译音及其汉译,经中外学者长期研究,“一般认为白狼语属藏缅语族,但究竟同哪种语言最近,则有藏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西夏语等不同说法”^④。这里的白狼部落应该同《隋书·西域·党项传》所载的白狼部落是族源相同的。可以设想,青藏高原的土著白狼所属的部族不断向东发展,东汉时已经抵达川西高原阿坝地区(汶山郡),再向北发展,到隋代就抵达了河湟地区(西平)。更值得重视的是,白狼语被论证属藏缅语族,同藏语、西夏语接近,这正是党项、吐蕃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之一。

至于把藏族也认定来自古代的西羌,更是经不起史实的检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西藏境内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那曲、聂拉木、定日等县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⑤。据藏文文献载,传说吐蕃民族“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传下的后裔^⑥。《后汉书·西羌传》载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汉军大败烧当羌,“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⑦。这里的“发羌”应该是古代典籍中提到吐蕃的最

① (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45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③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5页。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⑤ 参看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参看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下册),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⑦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84—2885页。

早记录。同《传》中还提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①。这就是说，直到范曄写《后汉书》时期，“发羌”还同中原没有往来，那它怎么会与早两三千年就已活跃在陇甘的古羌人同属一个族源呢？按藏文史籍记载：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西藏地区兴起了悉补野部吐蕃，第一代赞普号邬提悉补野，直到第七代赞普时，“尚保留着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和习俗”^②；7世纪时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进行改革，统一吐蕃全境，向唐求婚，臣服于唐。因此，吐蕃和古羌人的历史少有联系。《旧唐书·吐蕃传》只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其所出也。”^③可是《新唐书·吐蕃传》却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④可见称吐蕃为西羌，只是后人的推测。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指出：“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此说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演变，将吐蕃的形成过程，包括与其它民族同化、融合的历史简化甚至曲解，自然不是科学的论断。”^⑤我很赞同他的这个意见。

只有今天分布在四川岷江上游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羌族，一般都溯源至战国时期的南徙羌人。但是这支脱离主体的南徙羌人不能不同迁居地的原住民（大概是吐蕃的先民）交往；尤其是隋唐以后吐蕃迅速强盛，这支南徙羌人融合于吐蕃的成分也是很大的，不过还保留着原来的族称。

再说，《史记》、《汉书》中所谓的西南夷是对散布在今云贵和川西等地众多少数民族的总称。它分为农耕型和游牧型两类，农耕型民族以夜郎、滇、邛都为大，游牧型部族以隗、昆明为大。他们大都居住在高原的山地间，交通不便，秦汉以前，很少与外地交往。《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经夜郎进入滇池，后因秦并巴蜀，断了楚军的归路，于是只得“变服，从其俗”^⑥。也就是说，这支楚军融入到当时的滇族中去了。这应该是西南地区各民族进入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之中的最早记录。它也说明，春秋时代以前这些古代的西南地区各民族是无缘同在中原活动的华夏族或羌人交往的，因为在它的北面，还隔着巴人、蜀人和吐蕃的先民。因此把西南这些古代部族也归为三代

① （南朝）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98页。

② 参看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9页。

④ （唐）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1页。

⑤ 《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以前就活跃在河湟地区的古羌人的后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们知道,考古学者在云贵两省和川西不但收集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还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如云南的元谋人、丽江人,贵州的桐梓人、兴义人,四川的资阳人)。它们的地理位置是处在长江流域南方文化遗址之间,但是实际上不少学者把它同西羌挂上了钩,即将其归进了中原文化遗址中。他们甚至把同属汉藏语系也当作了论据之一。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汉语和藏语的近亲关系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汉藏语之间的联系环节的假设。从这个线索再推一步,我们又看到了和藏语近亲的彝语。而彝语的来源有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①这恐怕有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是中国境内西南高原文化遗址,它的进化较慢,进入中华民族大融合之中也较晚。这就是说,“西南夷”应是旧石器时期就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他们同说藏缅语是很自然的;不过,汉语和藏缅语同源关系的历史事实却是难以找到的。

二

语言是民族划分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正如索绪尔早已指出的:“认为语言相同可以断定血统相同,语言的系属同人类学的系属相吻合,那是错误的。”他还指出,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无比重要的、唯一基本的”因素是“民族统一体”,“所谓民族统一体就是一种以宗教、文化、共同防御等等多种关系为基础体的统一体”^②。中华民族同印欧诸民族的历史是不同的,华语(汉语)同印欧语的历史发展也是大有区别的。夏代以前的语言情况没有资料,尚难讨论;商、周的语言一致,已是大量文献资料所证实的。众所周知,周朝已有雅言、通语,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政策,保证了汉语书面语的统一,也对方言的分化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有文字记录以来三千多年,上古汉语(华语)只分化成现在的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没有继续分化成不同的语言。这是有案可查的。

语言有分化,自然也有融合。在中华大地,语言融合的事例,从古至今,不断出现。如:殷商的鬼方据说就是周代的猃狁、汉代的匈奴,可是唐朝以后这些名称不再见于史书,哪里去了?南匈奴融合到汉族里面来了。至于北匈奴,则在东汉桓帝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10—311页。

元嘉元年(151)以后,远徙顿河草原一带,5世纪初曾在中欧建立匈奴帝国,5世纪末就衰落下去,融合到欧洲别的民族中去了^①。从鬼方到匈奴所说的语言,原来肯定不是汉语,在他们融入汉族时,语言也就改用汉语了。说“匈奴语”一说“匈奴双语”一说“汉语”,这样一个语言的取代过程,也不妨看作是语言融合,广义的融合。又如:宋代源出鲜卑的契丹人在北方建立了辽国,稍后女真人又建立了金国,辽、金先后灭亡,南徙的契丹人、女真人与汉人杂处,大多融合到汉族中了,语言也被融合了。再如:满族本是元灭金后留住黑龙江的女真人,明朝晚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南向攻明。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势力日强;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十传九代,不到三百年,到现在也不到四百年,满汉已难分。虽然现在统计的满族人口还有四百多万(1982年统计为4299159人),但能说满语的人却已经很少^②。这应该是语言融合最清楚的事例。再看移居美国的华人,一两百年间有好几百万,由于散布在美国各地,也无法长期保持说汉语。华裔移民经过两三代,势必要改说美式英语。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向南发展,融合进汉族以后,其语言使用情况,大概都只能是这种结果。

南方的苗、瑶、壮、侗诸族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总的来看,汉族是向南扩张的,汉人到了南方,与土著杂处,仗着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数的优势,不断把他们融合进来,或者把他们挤上山区、边地。被挤上山区、边地的土著,虽然在大环境下也与汉人长期杂处,但保持着小聚居环境,因而几千年仍然保存着原有的语言。这些语言虽然也接受了汉语的影响而有某些趋同,但是并非同源关系。如果说有同源关系,那也是在旧石器时代的事情,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三

汉语与藏缅语族是否同源,除了从历史方面来探索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察,即用这几种语言的现代形式来检验它。这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大家知道,汉语是孤立语,无形态变化;藏缅语是黏着语,“有一定的形态变化”,“动词的语法范畴比较丰富”^③。汉藏同源说者认为藏语比汉语的形式古老,也就是说,汉语

① 参看刘作奎《被汉军打败逃到欧洲 匈奴西进改变欧洲历史》,载《科学大观园》2006年第17期。

② 由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代询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教授,承告:“目前能说满语的人仅在黑龙江的一些满族村屯及市、县,约百人,其中说得好的有十八位老人,年龄都在八十岁以上。”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页。

是由黏着语变成孤立语的。那么,用汉语三千多年可考的历史来检验这个假设,结果不能不说,这是缺乏根据的。

我曾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中,根据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来考察甲骨卜辞的词汇构成情况,指出“根据《甲骨文字典》所收近四千个义项来考察,其中所举复音结构不到一百个”,分成八类,经过分析,“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称(神名、方国名、地名、人名),又几乎全是偏正结构”,于是作出了一个结论说:“殷商时代语言的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少数复音结构应该是词组而不是词。”我同时又作出了另一结论说:“周代复音化现象十分明显,复音化的构词方式有两大类:一是多种形式的双音节的音变构词,二是多种形式的结构构词。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①后来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和崔立斌的《〈孟子〉词类研究》两部专著,提出了更加充实的证据和论述。

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用《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作资料,对甲骨卜辞的词类作了全面、穷尽性的研究,得出《摹释总集》全部用词共 1061 个。其中非祭祀动词 181 个,祭祀动词 81 个,形容词 11 个,普通名词 195 个,专有名词 550 个,数词 13 个,代词 7 个,副词 17 个,语气词 4 个,介词 2 个。除名词外,全部是单音词。名词中也只有专有名词有双音结构 87 个,人名(共 228 个)就占 72 个,其中妇名又占 31 个。如“妇好”、“妇康”,都是“妇+x”形式。国族名(共 106 个)双音结构 15 个,如“鬼方”、“人方”,“x+方”就占 12 个。地名(共 208 个)双音结构 6 个,如“有师”、“丘商”、“密山”、“黄林”。宫室名、星名等(共 8 个)双音结构 5 个:东寝、西寝、东室、南室、鸟星。《摹释总集》收甲骨五万多片,刻辞内容涉及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完全足以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这有力地证实了甲骨文单音节性质的特点。

崔立斌的《〈孟子〉词类研究》全面研究了《孟子》的词类,根据他研究的统计:“《孟子》一书共有 2886 个词,其中有单音词 2562 个,占 88.8%;双音词 300 个,三音节词 24 个。《孟子》中只有动词、形容词、名词有复音词,其他类词只有单音词,没有复音词。”^②具体情况是:不及物行为动词(95 个)中有双音词 19 个,如“驰驱”、

① 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44、164—165 页。

② 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